

爱思唯尔全球期刊出版总裁 Philippe Terheggen:

推动开放获取像解决碳排放般复杂

■本报记者 倪思洁

今年9月,来自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的欧洲11个科研资助机构决定向科学出版商施压,要求到2020年,由其资助的科学出版物必须在合规的开放获取期刊,或合规的开放存取平台上发布,不允许发表于像《自然》《科学》这类虽然接受单篇论文以开放获取方式出版,但整体上是订阅模式的期刊。

最近,支持这个名为“S计划”协议的科研资助机构,已经从原先的11个,增加到了13个。

这些国家和科研资助机构针对的对象,是包括爱思唯尔、自然、科学在内的大型出版集团。原本应该是一对好伙伴的科技界和出版商,最近几年,因为期刊费用涨价,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日前,《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爱思唯尔全球期刊出版总裁 Philippe Terheggen,了解出版方对于S计划的看法及其应对方式。

祸起“两头付费”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出版商和科研组织经常坐上谈判桌,在你看来,目前期刊与科研机构矛盾的“导火索”有哪些?

Terheggen:出版有两种模式,一是订阅模式,一是开放获取模式。我们与这些国家的谈判内容主要围绕着订阅和开放获取两种模式内容如何组合,以及如何实现用户的要求。

一些国家希望快速推动开放获取,希望其资助发表的文章能够在未来几年甚至马上就全部采用开放获取的方式出版。目前,仍有很多文章是以订阅模式出版的,这种混合出版模式使其既需要为采用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出版的文章支付费用,又需要为阅读

订阅模式出版的文章支付费用,在这个过程中,两头都需要费用,但预算是有限的。而以开放获取模式出版的文章,是可以免费阅读的。

我们理解有些国家的预算有限,所以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达成一致,找到一种把科研人员的利益作为优先考量因素的解决方案。

《中国科学报》:对于推动开放获取,爱思唯尔持什么态度?

Terheggen:对于爱思唯尔来说,我们是完全支持两种出版模式的。开放获取和订阅模式各有利弊,没有对错之分,同样重要。

目前,从全球来看,以订阅模式和开放获取模式出版的内容数量都在增长。通过开放模式出版的内容占16%,订阅模式出版的内容占84%。从增长速度来说,金色开放获取(即以作者支付开放获取出版费用为基础的出版)出版的内容每年增长12%至13%。订阅模式出版的内容每年增长2%左右。

目前,爱思唯尔的开放获取期刊已经达到180种。对于爱思唯尔来说,我们会听取科研人员的需求。我们始终要出版高质量的符合学术道德的内容。比方说,不会因为出版模式的不同而改变同行评议的质量。

和解决碳排放一样复杂

《中国科学报》:推动开放获取的理想路径是什么?

Terheggen:实现开放获取有点像解决碳排放问题,非常复杂,需要多方共同投入,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期待任何一个机构、国家或者是企业能够在明天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国家的预算,而且每个国家做的决定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这个影响是全球性的。

如果全球在实现开放获取上的步调一致,对于推动开放获取会非常有帮助。但是,即使所有的国家在实现开放获取目标上的步调是一致的,大家支付的费用也会是不同的。

在推动开放获取的过程中,先行动的国家往往会面临不利局面,因为它们既要为发表开放获取的文章付费,也要为阅读订阅模式出版的文章付费,这会增加其预算,承担高成本。而且,如果全球都变成彻底的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理论上讲,那些出版文章多的国家,例如中国和美国,就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而那些没有出版文章的国家就会不花一分钱读到全球的文献。这种成本间的不平衡导致大家矛盾的产生。

而且目前的状况是,一些国家希望能够尽快实现完全的开放获取,而很多国家对于开放获取没有兴趣,或者说暂时还没有兴趣。所以,“步调一致”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

《中国科学报》:在爱思唯尔看来,中国推动开放获取的兴趣怎么样?

Terheggen:目前就我们的了解,中国对于订阅出版的内容需求量很大。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政府表达出对于迅速推动金色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愿望,至少没有看到相关政策出台。未来,如果中国政府有这方面的考虑,我们也会积极倾听并支持中国的需求。

S计划并非清楚的方案

《中国科学报》:爱思唯尔如何评价S计划?

Terheggen:S计划是科学欧洲协会出台的一个框架协议,该协会的46个成员中有13个基金资助机构参与了S计划,这些基金资助机构所资助的科研产出占全球的6%左右。

对于爱思唯尔而言,我们支持S计划推动

开放获取的目标。在开放获取方面,爱思唯尔推出了一些新的期刊,已有的开放获取期刊也在不断发展。

但是,S计划目前还只是一个框架协议,而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行动方案。S计划现在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比如,执行方案到底如何,文章出版费的上限是多少,协议上所写的“从2020年1月1日开始”是指文章发表的时间、提交的时间还是基金机构确定项目的时间等。

关于S计划,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先看到更多细节,以判断其目标是否能够实现。

《中国科学报》:S计划公布后,爱思唯尔做了哪些工作?

Terheggen:我们了解了科研界对于S计划的反馈,倾听他们的声音。据我们了解,有些人向科学欧洲协会表达了他们的支持,有些人表达了他们的顾虑。

有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为开放获取指出了方向,我们非常欢迎。”也有些人说:“要是必须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上,那我就不能够在大多数的订阅期刊上发表文章,很多重要的期刊就无法发表了,这对于我的职业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些大学可能会觉得S计划会影响大学排名。还有一些学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也有顾虑,因为它们出版的期刊一般都是订阅期刊。

爱思唯尔是不能影响这13个欧洲科研资助机构的政策制定的。它们会听取我们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左右它们的决策。

在目前这个出版模式过渡的过程中,混合期刊提供了出版模式的选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科研人员需要其他的解决方案,我们也非常愿意做出调整。对于爱思唯尔来说,倾听并满足科研人员的需求是我们的目标。

科学七日

事件

大型输油管道项目受阻

美国蒙大拿州的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Keystone XL输油管道的建设。这条管道将把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含硫砂输送到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这位法官在11月8日的裁决中表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政府“简单地放弃了”该项目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在影响,并未为其颁发管道许可证的决定进行辩护。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曾在2015年驳回了该项目,原因是一项分析显示,其将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特朗普上台后,国务院于2017年3月为其发布了许可证,但环保人士和土著权利团体在联邦法院对这一举动提出了申诉。

朝鲜半岛传染病计划

朝鲜和韩国将建立一个共同应对传染病的系统,例如结核病,这是朝鲜的一个重大公共卫生威胁。一项试点计划将于今年年底开始,届时两国将在边境北部开城的一个联络处交流有关传染病的信息。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之前在平壤签署的一份声明中提出,该协议是双方扩大公共卫生合作的承诺的一部分。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健康与联合研究所所长、儿科肿瘤学家Shin Hee Young表示,该协议是朝韩自由往来的第一步。Shin说,在朝鲜肆虐的细菌性疾病,如结核病、风湿热和猩红热,在韩国并不常见。他说:“但当病毒携带者不受任何限制地越境时,南部地区就会出现肺结核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朝鲜在2017年报告了逾10.7万例结核病病例,导致约1.6万人死亡。

政策

减少“官面文章”

根据欧洲审计法院(ECA)11月6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欧洲委员会已经减少了申请其研究旗舰项目资助的科学家所要经历的复杂政府程序。欧盟委员会曾试图减少其耗资764亿欧元(约合860亿美元)的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的官僚程序。相关措施包括集中支助服务和制定单一的参与规则。ECA发现,这些改变减轻了赠款申请人的行政负担,缩短了申请和领取赠款的时间。但报告也指出了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欧盟委员会可以通过做更多工作,帮助那些提交了高质量申请计划但不成功的申请者从其他来源获得资金。

化学品政策

欧盟委员会于11月7日通过了一项打击使用内分泌干扰物(EDC)的计划。这些化学物质能使荷尔蒙系统失衡,有证据表明它们会损害人类健康,影响野生动物。欧盟委员会的28名委员——每个成员国各有1名委员——批准了一项期待已久的EDC监管计划。EDC存



► Bradley Efron
图片来源:Rod Searcey

在于一些杀虫剂和杀菌剂中,与癌症、肥胖和生育率下降有关。该计划包括推动进一步的研究,对现有的EDC立法进行检查以找出缺陷,以及改进检测方法等。但包括比利时“欧洲拒绝EDC”联盟在内的批评人士表示,该计划缺乏减少有害暴露的具体措施。

奖励

统计“巨星”获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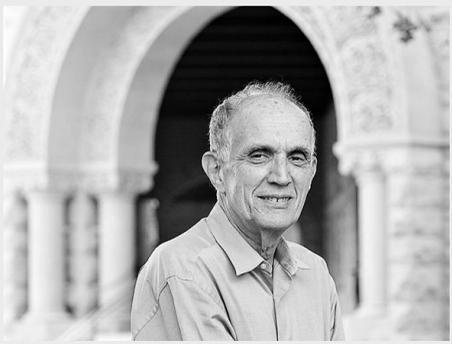
11月12日,美国统计协会(ASA)宣布,加州斯坦福大学统计学家Bradley Efron因首创Bootstrap法获得了2018年度国际统计学奖。在20世纪70年代,Efron等人意识到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将使计算密集型的新测试成为可能。Bootstrap法是第一个此类方法。它以随机的方式对数据样本进行划分,并计算出结论是否可靠。国际统计学奖于2016年首次颁发,奖金8万美元,每两年颁发一次,英国统计学家David Cox是第一个获奖者。现年80岁的Efron表示,他对获奖感到“激动”。他说,科学家常常要等上好多年才能得到“一轮热烈的掌声”,但等待的结果是好的,“感觉极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统计学家Sally Morton表示,Efron是“统计学的摇滚明星,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统计学家和科学家”。

京都奖颁发

2018年度京都奖11月10日在日本京都举行颁奖典礼,日本和美国的3位科学家和艺术家分别领取了1亿日元(约合611万元人民币)的奖金。今年的先进技术奖颁发给了美国

输油管道抗议者

图片来源:Andrew Lichtenstein



气候变化影响雨林

英国学者表示,气候变化正导致亚马孙雨林的树木种类构成逐渐变化,但雨林的变化速度还不足以适应地球大环境的变化,因此需要加强对亚马孙雨林的保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化带来诸多影响,如干旱加剧、温度升高,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大环境的改变逐渐影响到亚马孙雨林中不少物种的生存。那些在干旱面前比较脆弱的树种死亡概率增大,而能适应这种干旱环境的树种的生长速度又没跟上。

趋势观察

10月9日公布的一项对100个国家近7000名研究人员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2/3的研究人员发现,准备稿件和回应同行评议意见都很困难。报告指出,这些问题可能源于语言障碍。大约70%的受访者来自新兴的科学强国:巴西、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其中只有11%的人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45%的人表示用英语写作很困难。该调查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编辑公司Editage在2016年12月至2018年1月之间进行的,该公司提供语言编辑和出版支持。2/3发表过论文的受访者认为,期刊的指导方针总体上是不明确、不完整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3/4的受访者表示,撰写英文稿件是出版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报告称,出版业需要考虑如何消除或减少母语不是英语的作者额外负担。否则,期刊就会有错失重要研究成果的风险,因为作者可能会选择投稿给母语出版物。(唐一尘)

科学线人

全球科技政策新闻与解析

美一考古学会拟重新命名



黎巴嫩西顿墓穴在ASOR的支持下被发掘。
图片来源:DEA Picture Library

美国一个最古老考古学会的许多成员,对其学会的名字感到非常尴尬,以至于他们总是用缩写ASOR称呼这个学会。而且,该学会也在其网站上隐藏了它的全名。

现在有人说,是时候改变了。在近日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举行的美国东方研究学院学会年会上,与会者讨论了是否给这个有着118年历史的学会重新命名,理由是它的名字名不副实,而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伊利诺伊州盖尔斯堡诺克斯学院考古学家Danielle Fatkin表示:“我担心,用‘东方’这个词来命名会让学生远离我们。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群体,我们需要进行更广泛的对话。”

2016年,美国政府停止使用“东方”“黑人”“爱斯基摩人”等被视为具有冒犯性和文化不敏感的词。

ASOR是在西方学者对近东古代文化日益感兴趣的背景下成立的,因此研究人员将学会命名为“东方”。该学会最初的总部是耶路撒冷,但ASOR后来在巴格达、安曼和塞浦路斯斯科西亚建立了分支机构。

该学会现在出版3种期刊——《楔形文字研究杂志》《近东考古学》和《ASOR公报》,以及书籍和专著。

ASOR现任会长、达特茅斯学院宗教学者Susan Ackerman说,ASOR还资助学生进行考古发掘,自2014年以来,该学会已经帮助解决了中东和北非的文化遗产危机。ASOR记录了这些地区的破坏情况,并支持当地保护文化遗产的努力。

Ackerman对ASOR目前名字的不满不仅仅是“东方”这个词。因为,该学会1/4的成员拥有非美国地址,她表示,目前该学会的名字中,“美国”感觉不太对,‘学校’是模糊的,‘东方’是有问题的,只有‘研究’有用,我们做研究”。

但如何称呼该学会呢?Ackerman说,1982年的一次类似讨论产生了11个可能的名字,但该组织的董事会认为没有一个名字是完全正确的。她说:“另一种选择是,取一个不超过26个单词的名字。”(鲁亦)

美青少年气候诉讼案继续推进



一群年轻人起诉美国政府,要求政府对气候变化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图片来源:Robin Loznak

美国最高法院近日表示,年轻人对政府提起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诉讼可以继续推进。本案名为朱莉安娜诉美国案,原计划于10月29日在俄勒冈州尤金市联邦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但在唐纳德·特朗普政府要求最高法院介入并驳回此案后,庭审计划于上月被取消。

原告包括21名年龄在11岁到22岁的年轻人,他们指控政府未能阻止危险的气候变化,侵犯了宪法赋予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他们要求地方法院命令联邦政府制订一项计划,以确保到2100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降至百万分之350以下,低于2017年百万分之405的平均水平。

而美国司法部则辩称“没有权利”建立一个能够维持人类生命的气候系统”——正如该案件原告所要求的那样。

尽管最高法院现在拒绝了特朗普政府驳回此案的请求,但该案的未来道路尚不明朗。在11月2日的宣判中,最高法院建议联邦上诉法院在俄勒冈州地方法院开始审判之前,应该考虑政府的观点。

这些年轻人的律师表示,他们将推动地方法院重新安排庭审。“我们国家的青年赢得了最高法院的一个重要决定,这显示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也必须遵循规则和诉讼过程。”原告之一Julia Olson说。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各地的律师已经向地方和国家政府及企业提起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诉讼。这些诉讼通常是为了迫使政府采取强硬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这是很难通过政治手段实现的。

许多案件都以失败告终。但2015年,一个名为Urgenda基金会的公民组织赢得了一场历史性胜利,击败了荷兰政府。该案的法官命令荷兰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到1990年水平的25%,理由是“当前和未来几代荷兰人”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损害,以及政府“预防有害气候变化的义务”。荷兰一家上诉法院上个月维持了该判决。(唐一尘)